

## 首届 IZA&DC 青年学者项目参会感想

高翔\*

今年 10 月我有幸参加了由德国劳动经济研究所(IZA)和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 经济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联合主办的首届 IZA&DC 青年学者项目。<sup>①</sup> 这次项目旨在促进参会学生与位于华盛顿地区的经济学研究机构中 IZA 兼职研究员进行学习交流,并向当前著名劳动经济学家学习该领域前沿理论和研究方法。<sup>②</sup> ③共有来自全世界的 10 位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参加了这个项目,除我之外的另外 9 名学生分别就读于印度、新西兰、加拿大和欧洲的经济学博士项目。

与普通的会议或学术研讨会相比,这次项目不但促进了参会学生之间的学术交流,还为参会学生提供了许多向知名劳动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华盛顿地区的劳动经济学研究人员学习的机会。在 10 月 22-26 号 5 天的日程中每天上午宣讲并讨论两名学生的论文,下午分别和自己赴美之前预约的 IZA 在华盛顿地区的兼职研究员单独面谈,然后是参加乔治城大学经济系每天下午的学术讨论会。此外项目还安排了学生与学术讨论会的主讲教授共进午餐和集体会见。主讲的五位教授都是当前国际知名的劳动经济学家,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 Joshua Angrist 教授,巴黎政治学院的 Jean-Marc Robin 教授,纽约大学的 Raquel Fernandez 教授,马里兰大学的 John Ham 教授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Petra Todd 教授。

这次项目使我在选题、研究方法、论文写作和演讲等诸多方面都受益良多。比如很多教授都强调博士生要先打好基础不能好高骛远,做学生期间主要是积累所在领域的文献,学习主要的研究方法和如何选择自己能够处理又能对文献有贡献的题目,这样就为以后长期的学术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而认为自己在读博期间就能够找到一个特别有创意的题目并且做得特别好能在顶尖杂志上发表的想法是非常不现实的,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著名劳动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 Joshua Angrist 专门强调了博士生的写作和演讲能力,他说写作和演讲不好并不是语言问题而是思维问题,如果英文写不好,用自己的母语照样写不清楚。他觉得即使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写作能力也很差,他经常大声训斥自己的学生要求他们加强写作方面的训练。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几篇经典论文一字一句地

\* 作者系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 shine1870@gmail.com。

① 感谢 WISE 沈凯玲老师提名我竞争这次机会,感谢我的主导师和我参会论文的合作者傅十和老师在这方面提供的帮助,使我的整个旅程和各方面手续办理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② 包括乔治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世界银行,美国劳动统计局等。

③ 这次项目的官方网址是 [http://www.iza.org/conference\\_files/YSP2012/viewProgram?conf\\_id=2263](http://www.iza.org/conference_files/YSP2012/viewProgram?conf_id=2263)。

仔细研究别人是如何遣词造句的, 全篇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以及每段每句都起着什么样的作用。Angrist 教授说除非觉得自己已经达到拿诺贝尔奖的水平了, 否则就不要想着要有原创性, 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模仿! 他还认为提高演讲水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实践和练习。

来自巴黎政治学院的 Jean-Marc Robin 教授强调了在论文投稿时摘要和引言第一段就要清晰地写出本篇文章所做的工作和贡献, 否则审稿人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再仔细往下看。另外有很多博士生认为只要自己很优秀, 论文质量很高就够了, 不需要做其他的准备工作。Jean-Marc Robin 教授认为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 必须要通过多参加会议和其他各种学术活动在博士生阶段就开始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 这对于发表论文和毕业求职都相当重要。他也十分重视演讲能力, 必须为自己和自己的论文做好“广告”。

其他几位教授在论文选题、投稿期刊选择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都介绍了自己丰富的经验。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Petra Todd 教授认为在投稿中主编的个人偏好会起很大的作用, 一次被拒千万不要灰心, 可能仅仅是该期刊主编不喜欢论文的主题, 而不是自己的论文质量不够。但是如果被同一档次的期刊拒绝了两三次就要考虑投较低档次了。她还告诉我们虽然与别人合作的论文也可以作为求职论文, 但是独立作者会更好。

来自纽约大学的 Raquel Fernandez 教授认为学术领域都是人为划分的, 不必太过在意, 重要的是找到有价值的问题。而来自马里兰大学的 John Ham 教授认为如果发现了一个自己觉得有意思但是不熟悉的话题应该找有相关经验的研究者合作。

在与其他参会人员的交流中, 大家也相互介绍了各自的研究领域和所在国家的学术环境。来自印度的 Soham Sahoo 同学就读于印度一所顶尖的研究院, 主要研究基础教育问题。他告诉我们现在印度大学经济系的教学人员 90% 都是毕业于北美的博士, 所以他们这些本土博士的就业形势很严峻。这种情况与我们中国现在的趋势很相似, 只是“海归”教师的比例比我们还要更高很多。来自欧洲的几位同学主要研究的是欧盟内部国家的劳动力市场, 他们中有人想尝试毕业后到北美大学找教职。但是 John Ham 教授委婉地说这很难, 主要是关系网络问题, 北美的经济系招人时还是更认可他们本国认识的教授推荐的学生。

在项目的正式日程之外我还参观了乔治城大学图书馆和经济系并与那里的博士生交流, 我发现我们 WISE 的博士培养体系确实已经与北美非常相近, 学生每天的学习和学术活动以及师生关系等等各方面都很相似。并且前文所述的关于论文写作、投稿和演讲技巧等方面的内容, 我们 WISE 的老师也经常强调, 只是很多学生平时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由于我是第一次出国, 所以除了项目本身之外其他方面也收获也不小。我徒步游览了乔治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及周边很多地方, 对美国大学的学习生活节奏和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也有了一个初步的表面认识。我也希望更多的同学有更多的机会出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 中意美三国求学的感受

葛人杰<sup>\*</sup>

大概很少有人会像我一样，在博士三年级的“高龄”，选择放弃学位，出国留学。

2010 年的夏天，在被申请的 15 个国外大学的博士项目陆续拒绝之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意大利卡洛阿尔贝托学院经济学硕士项目的录取信。这个项目为期一年，提供不多的奖学金。因为我的目标是博士学位，所以假如接受这个项目，那么一年后我需要再申请一次。一方面是难得的出国机会，但也意味着不确定的未来。另一方面，如果我选择留下，一年后即将可以拿到国内学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经过短暂的犹豫，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两个月后，我来到了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镇，开始了那里的硕士学习。后来，运气加上努力，半年后我成功申请到了现在的学校——坐落在美国华盛顿市的乔治城大学。如今进入高校学习近十年，出国也已两年过半。一年的欧洲经历和一年半的美国经历，让我对国内国外的经济学教育方式的差别也有了深切的体会。下面，我将对本科和研究生两个阶段的感受分别细述，最后着重比较数学教育上的差异。

### 本科阶段

我的本科专业是经济学。单从专业知识本身而言，本科四年的学习并没有让我觉得有很大收获。课堂上那些照本宣科的讲解和教材里模糊不清的定义和句子，时常让人如坠云雾。当然现在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曼昆、范里安等的最新版教材已填补了原来的空白，各大高校经济学专业也基本以它们作为标准参考书。2006 年左右，包括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厦门大学等在内的一些院校先后开始了现代经济学教育改革的尝试。不少新的院系设立并开始大规模招募海归，这些改革对国内的经济学教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现代经济学知识由以往集中在清华北大等几个少数高校的格局逐渐改变。这些海归老师、英文教材和现代经济学课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学课堂里原来的沉闷气氛。

尽管如此，中国和美国经济学教育差距仍然巨大。这个学期我做助教的发展经济学是一门面向高年级本科生的课。然而，论深度和广度，这门课涉及到的理论知识在我看

---

<sup>\*</sup> 作者系美国乔治城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作者电子邮箱：gerenjje84@hotmail.com。

来已大大超过了普通国内本科的水平，因为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数学工具的应用。在与学生们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们很多人在数学知识上有所欠缺，有些人甚至对基本的求导和积分都不熟悉。但即便如此，他们却大都能很好地完成作业和考试。我想这应该归功于老师注重实际的讲解和考核方式。在课堂上，老师并不拘泥于某个模型或某个数学符号，她关心的是学生是否可以很快联系上现实，找到模型中的现实对应，从而理解其中的逻辑关系和机制。因此，在答题时无需太深的数学基础，只需要有良好的经济学直觉。

相比之下，国内的课堂却常常走向两个极端。一种课程是对理论生硬照搬的架空式教学。比如在宏观经济学的课堂上，我们会用 IS-LM 模型来分析利率是怎么决定的，如何影响宏观经济。但是这些模型都是有假设条件的，这些条件往往更符合欧美的经济现实。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又该怎样理解，情形又是怎样，老师却很少能联系到现实情况加以分析。如此，学生只是记住了一个模型；学会了理论，却与现实脱钩。另外一种情形恰恰相反，课堂上老师喜欢大谈常识性的问题，却很少涉及理论知识。这样的课看似和现实联系紧密，但往往无法帮助学生建立起分析的框架，无法帮助他们理解稍微复杂些的问题。学生们固然了解了很多事实，但该轮到自己分析现象时却不知所措。

## 研究生阶段

欧美的经济学硕士项目一般为一到两年。与中国不同，经济学硕士项目主要不是为了培养职业型人才，而是为博士学位做准备。因此理论课程相较于应用课程为多。各个项目虽不同，但课程一般会包括高级微观、高级宏观和高级计量经济学（此处的高级指数学的大量应用），以及与经济学相关的基础数学课。

近几年来，欧洲的研究生项目一直在学习美国。这不光体现在师资人员的构成上，比如我所在的意大利的那个项目招聘的几乎都是北美名校的经济学博士，还体现在学制上，欧洲很多以往的导师制（师傅带徒弟）也逐渐变成像美国那样的批量生产博士，即前期集中强化训练，后期导师组负责定向培养。但是欧洲有别于美国的一点是，他们的硕士项目水准一般比较高，竞争也很激烈。不像很多美国的硕士项目，并不受到重视，有些设立的原因只是为博士项目融资。因此，有不少欧洲的博士项目只招收自家的硕士，因为他们知道外来的质量不能保证。另外，欧洲的硕士项目往往愿意提供奖学金给出色的学生，这也是他们竞争激烈的一个原因。而在美国，即使是好的硕士项目，拿到奖学金的可能性也并不大。

国内改革后的经济学博士项目多采取四年制，这也是在学习美国，只是相比美国少了一年。不少学校对博士生毕业时却有论文发表的要求，这种做法不免有些功利。一般英文论文的发表周期在三到四年，而中文论文宽松的话是一到两年，但也有更长的。如

果想在毕业时发表，那就得起码在第三年的时候甚至更早就必须有成稿，并且尝试着投稿。这就不得不逼着博士生在第二年甚至在第一年学习的时候腾出时间来写论文。这大量侵占了学生正常的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时间，从而博士生的基本功也就大受影响。

在美国的博士项目里，有论文发表固然很好，但这并非硬性规定。我在乔治城第一年的时候，曾想去旁听一门给二年级学生开的专业课，以期尽快进入研究状态，写出论文。但不少老师，甚至包括研究生项目主任，都建议我不要这么做。他们希望博士生在第一年能把基础知识学好；至于研究，那是之后的事。

## 数学

对很多非数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博士阶段的课程可能并不简单。现代经济学已经越来越强调数理模型的应用，因此，光有基本的经济学课程打底是远远不够的。在意大利的那一年，虽然在开学前已有针对性的数学训练，但我的很多非数学专业的同学最初仍不太适应，只有其中一位例外。他是一位物理学博士，之前没有上过任何经济学的课。这位同学曾对我说他觉得经济学只是一种抽象的思维方式，而他喜欢这种思维方式。我想这和他的理科数学背景应该是分不开的。

中国对数学教育向来是比较重视。相比于国外的学生，中国的学生基本很少会在数学上遇到什么困难。所以，国人常被认为格外聪明或在数学上有格外的天赋。但对国内很多经济系的学生来说，数学教育与经济学教育却是脱节的。我们有比欧美学生难度更高的数学课，但却难以找到适合我们实际水平和需要的课程；我们也有高水平的经济学课程，有国外学者来做短期课程，有频繁的学术研讨，但不知是师资力量还没跟上，还是四年的学制过于紧张，我们的经济学教育却鲜有相应的数学课程作为辅助。如果学生有数学或者工科背景还好，否则，很多数学知识甚至需要在课上补充。这种打补丁的方式与系统的学习效果是不能比的，既耽误了正常的教学时间，也降低了教学质量。

在美国，数学课并不难，但课程设置却非常合理。每门课之间都有必要的衔接，甚至在学生选修哪门课之前，课程说明都会指出该生应该至少学过哪些相关的基础课或数学课。在硕士或博士招生的时候，招生说明一般也会指明要求学生最好之前应掌握哪些数学知识，而且在正式入学之前也会有相应的短期数学集训，确保不同基础的人都掌握了基本工具，最终能在同一平台学习。相比之下，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经济学院系能做到这一点。

## 一个经济学家和他的时代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钱继伟\*

宇泽弘文 (Hirofumi Uzawa) 是日本乃至世界上最杰出的理论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关于两部门增长模型的文章至今还在主流大学研究生的读书单上。他在 1965 年就讨论了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环环相生的关系, 领先后来的内生增长理论二十年。宇泽在一般均衡理论和凯恩斯理论上也有开创性的论文。宇泽在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东京大学执教多年。他的学生不少后来都是学界翘楚, 还有学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89 年, 宇泽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1997 年宇泽获得日本文化界的最高荣誉——日本文化勋章。宇泽的学术经历可参见他的学生康奈尔大学教授 Karl Shell 在 2009 年发表在《宏观经济动态》杂志 (Macroeconomic Dynamics) 上的采访录。

岩波书店的大塚信一在他的新书《追求出版理想國》中记录了他在岩波书店四十年的编辑岁月。大塚在书中动情地回忆了与宇泽弘文的交往, 生动地展现了宇泽在经济理论研究之外的学术理念的另一面。<sup>①</sup>

1974 年, 大塚在岩波书店负责编辑“岩波新书”。大塚身为编辑, 需要找大学教授讨论合适的出版选题。当时四十五六岁的宇泽是作为美国回来的新锐经济学者被资深编辑介绍给大塚的。初次见面, 宇泽表示希望能在岩波出版关于汽车的社会性费用的书 (social cost of automobile)。汽车所引起的社会性费用包括污染、花费大量资源建设的基本设施等等。1970 年代的日本, 经济腾飞, 但环境问题相当严重。宇泽对汽车造成的污染, 对人类安全的威胁, 如鲠在喉。汽车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 在经济学上合理吗? 岩波书店同意了这个选题。宇泽毫不含糊一口气写完了《汽车的社会社会性费用》一书。

在这本书中, 宇泽强调了汽车对生态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外部性。外部性可以是静态的。比如说, 紧靠人行道的汽车道, 往往对行人走路造成了困扰。外部性也可以是动态的、长期的。比如说为了汽车使用而建设的道路、隧道、桥梁对当地社区生活方式的影响。这样的外部性往往会造成社会成本被大大低估。在这本书中, 宇泽估算每部

\* 作者钱继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作者电子信箱: eaiqj@nus.edu.sg。作者感谢神门善久教授和匿名评审人的评论。

<sup>①</sup> 日本出版界有句俗话“大众文化找讲谈社, 高级文化找岩波”。岩波书店出版的书在日本知识界影响极大, 其中的“岩波新书”享有盛名。“岩波新书”是向大众普及学术的一套丛书, 其内容相当广泛, 涵盖了哲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

车每年的社会性费用可超过两百万日元。

这本《汽车的社会性费用》出版后，影响很大。<sup>①</sup>编辑部收到了许多的读者来信。有读者说：“看了这本书，我把自己的驾照撕毁了。”但宇泽也收到了许多威胁电话和相关利益集团有组织的批判。大塚还记录了一件宇泽和汽车的趣事。宇泽和大塚一次喝酒喝到深夜，误了最后一班的电车和地铁。大塚无奈之中将宇泽塞入了计程车。宇泽打开车窗，双手合十，连声说“对不起”。宇泽表示对坐汽车感到羞耻吧。

在岩波书店从事了四十年的编辑工作，大塚信一在 2003 年以社长身分退休。当他被问到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哪一本书最满意。大塚道“书的最重要的要素是影响读者，进而使社会发生变革”。大塚说，如果要举出一本书，那就是宇泽弘文的《汽车的社会性费用》。宇泽在《汽车的社会性费用》一书中抛出的许多议题，如对废气的规制、车道和人行道的分离、行人天桥的建设等，日后都逐一实现了。

《汽车的社会性费用》出版后的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宇泽弘文的许多著作在岩波书店出版，包括讨论全球暖化、社会问题和数学教育等等。当然，宇泽对经济学的思考，也通过“岩波新书”在日本传播。宇泽在 1989 年的《经济学的思考方式》一吐胸臆：“我想强调的面向是，经济学者如何理解活生生的时代状况，促使经济学的理论升华。”

一次，宇泽在研讨会中，运用经济学模型分析日本经济的问题。宇泽犀利的分析方法，打动了在座的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在场的大塚信一感到宇泽的分析相当“动人”。但接下来的一瞬间，宇泽在黑板上的公式上打了个大大的“X”，说“这种模型无法把握日本的真实面貌。为什么呢？因为环境破坏和公害等最重要的因素并没有放在这个模型中。”宇泽表示正致力于研究能解决这些问题的经济学。

“活生生的时代状况”一直都反映在宇泽弘文的研究中。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为了建设成田机场，当局与被征地的农民的纠纷长达几十年，史称“成田机场事件”。成田机场事件是战后以来日本最大的有关基建项目的社会运动。1966 年 7 月，内阁做出在成田市建设新国际机场的决定。内阁事先却未与地方政府和当地民众进行协商，从而激起了地方上民众、社会运动人士、学生参与的抗争。到 1993 年 5 月为止，成田机场事件造成了上万人受伤。

1991 年，一个调解成田机场事件的非官方的隅谷调查团组成。宇泽作为隅谷调查团的五名成员之一，最终设法找到符合社会正义的解决方案。90 年代初，宇泽弘文的“岩波新书”《“成田”是什么——战后日本的悲剧》就探讨了成田机场事件。和汽车有社会性费用一样，基建项目也有极大的社会性费用。如果承认这一点，要建设成田机场，必须估算社会性费用；同时，受到影响的关系人应当得到相应的赔偿。几年间，宇泽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调查；平时出行只能乘坐有警察随行的车辆，即使喝杯酒也有警察盯梢。

<sup>①</sup> 该书的中文版《汽车的社会性费用》已于 2013 年作为东亚人文 100 丛书的一种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他的目的是“清理成田斗争的轨迹，也就能看清战后日本的面对的最大悲剧——‘成田’的本质”。具体来说，日本的民法对土地所有权的定义相对简单，而这法律上的定义和日本社区传统上对公地财产(common)包括土地、森林、河流等的认知不一致。战后日本许多社会抗争就是由于农民对公地财产的诉求和官方的定义脱节所致。

宇泽用社会公用资本（social common capital）这个概念来定义维持人们生活的有形和无形的公共资本。社会公用资本包括自然资源资本（nature capital）、社会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和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自然资源资本包括公地财产；社会基础设施包括桥梁、道路、排水设施等等；制度资本包括法律、医疗、教育等等。由于其外部性，社会公用资本的价格在市场上无法体现。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要探讨在市场活动和社会公用资本之间最优的资源配置，宇泽认为需要理解活生生的时代状况。汽车的社会性费用和成田机场事件就是两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

#### 参考文献：

大塚信一，2012，《追求出版理想國：我在岩波書店的 40 年》，馬健全、楊晶譯，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宇泽弘文，2013，《汽车的社会性费用》，郑剑译，四川教育出版社。

Uzawa, Hirofumi, 2009, Social common capital, 2009 Blue Planet Prize Commemorative Lecture.

Karl Shell, 2009, An interview with Hirofumi Uzawa, *Macroeconomic Dynamics* 13, 390 - 420.